

广州鲁迅与“在朝革命”

邱焕星

内容提要 “广州鲁迅”呈现了一个知识分子“在朝革命”的复杂状态，他经历了“主动呼应革命—被动革命重构—文学政治创造”的阶段变化。鲁迅最初是背着战士的招牌，主动呼应国民革命和党化教育的，但随着“革命”退化为专制“政治”后开始清党杀戮，他否定了国民革命的合法性，重构出一个被动革命的鲁迅形象，并在退往上海后全面反思了知识阶级和文学的命运问题，提出了“革命同路人”和“革命人文学”的“文学政治”存在模式，创造了一个独特的“鲁迅革命传统”。从“在野革命”到“在朝革命”再到“在朝政治”，南北革命机制的不同造就了多重的广州鲁迅革命状态，它反映了鲁迅思想和知识分子革命的复杂性，这实际是内因与外因、主动与被动交相混合的产物。

关键词 广州鲁迅；在朝革命；文学政治

“假如鲁迅活着”，是一个被坊间广泛讨论的话题，其实质是怀疑知识分子在革命成功后的命运问题。参与者虽然对此事的真实性有过各种质疑，但对“（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1]这个判断却无太多分歧，在他们看来，“‘左’的政治是容不得鲁迅的，我相信鲁迅也不会低眉俯首，逆来顺受当顺民。于是，鲁迅只有缄口，只有当‘右派’，或是坐牢”^[2]。这当然只是个假设，它反映的实际是今人对“知识分子和革命”的看法，通过强调革命会变质，但鲁迅不会变，来建构一个与政统对抗而非合作的现代批判知识分子道统。

事实果真如此吗？仔细回顾鲁迅的历史可以发现，虽然他一生大多数时期都处于“在野革命”的状态，但“广州鲁迅”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朝革命”的珍贵样本，他在“清党”后确实一度“不做声”而后来“还是要写”，但“清党”前他却努力配合革命党来推动国民革命，其动员功能甚至压倒了批判功能，以致清党后痛责“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3]。显然，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因而深入探究“广州鲁迅”与“在朝革命”的复杂关系和演变过程，就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但从既往研究来看，一种解读认为鲁迅在广州是“被挟裹的革命”，最终发现了国民党的反

动而转向了共产党^[4]，另一种解读则认为鲁迅“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自由思想，不肯依附于任何一种政治势力”^[5]，前者强调鲁迅的被动，后者强调鲁迅的独立，显然都是将历史做了简单化的处理。

一 广州认同与“两种矛盾思想”

鲁迅最初南下，并非是想去广州参加革命，“如果不是和段章之流大斗，致列于几十位被捕者之林，和另外的原因，大约未必会离开北京的”^[6]，他之所以选择了厦门，一是为了逃避奉系军阀的恐怖统治，寻找“避难桃源”^[7]，二是和许广平约定“分头苦干两年”^[8]，到厦大“求生活之费”^[9]。实际上，鲁迅此时对南方的革命形势并不看好，虽然他在北京时曾经参与过国民革命的一些外围活动，和国共两党一起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共同对抗过北洋政府，但双方更多是一种基于共同斗争需要而形成的合作关系^[10]。鲁迅自言“政治上的事，我其实不很了然”^[11]，他和国民革命之间有着不小的错位，不但支持“除军阀”更甚于“打倒列强”，而且对群众运动始终持怀疑态度，甚至直到面临政治迫害时，他在《大衍发微》中对通缉名单的解读，仍然着眼于教育界的派系冲突，而非国民革命和政党政治的眼光。

而国民革命在北京的迅速溃败，也不能从根本上打动鲁迅，所以他才会在北伐刚开始的时候，颇为悲观地说“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就“没有革命”^[12]。事实上，“当时北方各军阀并没有把南方改组后的国民党和随后成立的国民政府放在眼里。……认为它不过是跟着苏俄‘赤化’而已。甚至直到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北方各军阀仍未把北伐军当成自己的一个重大威胁”^[13]。

也正因此，鲁迅南下起初的打算是“很想休息休息”，“目的是：一，专门讲书，少问别事，二，弄几文钱，以助家用”^[14]。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身在厦门的鲁迅从这场被视为“第二次辛亥革命”的战争中，看到了国家统一和民族新生的希望，他开始和许广平在通信中不断交流信息和看法。

鲁迅一直以喜悦的心情关注着北伐的战况，积极拥护南方国民政府的军事行动，甚至他还批评“国民党则太老实”，“对于异党宽宏大量”，竟然允许研究系的科学会学者在广州开会，他说：“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造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15]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社会的普遍态度，“民十五六年之间，全国多数人心的倾向中国国民党，真是六七十年来所没有的新气象”^[16]，譬如周作人就认为“这不是两地方的人的战争，乃是思想的战争。南北之战，应当改称民主思想与酋长思想之战才对”^[17]，而胡适更是盛赞“南方革命军的北伐赢得了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南方政府是中国最好的、最有效率的政府”^[18]。

正是北伐的巨大胜利，唤起了鲁迅因辛亥革命的失败而丧失的政治热情，他越来越认同广州的国民政府。另一方面，由于鲁迅在北京时的思想革命和反政府活动，他被舆论视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和“青年叛徒的领袖”，因而广州政府也看中了鲁迅的影响力，借中山大学改制之机，邀请鲁迅“去指示一切”“议定学制”^[19]。而中大改制的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是国民革命和党化教育的需要，“中山大学为中央最高学府，极应实施纯粹之党化教育，养成革命之前驱，以树建设之基础”^[20]，它以孙中山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为

校训，以“革命科学化，科学革命化”为办学方针，因而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分别被视为国民党的“文学校”和“武学校”。其次涉及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大前身是国立广东大学，最初是右派邹鲁掌权，之后被汪精卫控制，而随着蒋介石地位的上升，他推荐了戴季陶为中大第一任校长，但戴深知中大内部共产派和极右派斗争激烈，因而提出了三项就职前提：一是改中大校长制为委员制，二是实施党化教育，三是解散学校，重新整理。不久，戴季陶联合左派清除以树的党为代表的极右派，通过考试淘汰了二百余名学生，而教师则全部重聘，“留者最多不过四分之一。一切无学识之饭桶，及为树的党拉线之反动分子，已经清除净尽”^[21]。

而据当时任中共中山大学总支部书记的徐彬如回忆，“因当时中大我党势力大，戴季陶不同我们接头，不得我们允许，是进不了中大的”，在这种情况下，“戴季陶在上海与陈独秀见面”，陈独秀指示广东区委向戴季陶“提出许多条件，聘请鲁迅便是其中一条”，因为中大此前的文科学长郭沫若要求入党并参加北伐，为填补此空缺，“我们提出要请鲁迅来中大当文学系主任”，除此之外，“国民党右派也企图争取鲁迅，写欢迎鲁迅的文章”^[22]。鲁迅人还没到广州，各方势力已展开了博弈。

鲁迅自然不知道这背后的复杂情况，他自己还通过私人关系积极寻求进入广州的路径，1926年10月18日许广平来信劝鲁迅“来粤就事”，认为“像顾孟余，于树德……你都可以设法”^[23]，于是，鲁迅趁孙伏园10月20日赴广州的机会，“托伏园面托孟余”^[24]，“孙到校访各委员，具道鲁迅愿至粤意，彼等示欢迎”^[25]，最终鲁迅被聘为中大唯一的正教授和中文系主任，此时的他“思想已经有些改变”，“沉静而大胆，颓唐的气息全没有了”^[26]，“抱着和爱而一类的梦，到了广州”^[27]。

在这一时期的通信中，鲁迅对许广平说：“其实我也还有一点野心，也想到广州后，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至多无非不能回北京去，并不在意。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甚至鲁迅在听到“政府将移武昌”的消息后颇为失望，担心“广州情状，恐怕比较地要不及先前热闹了”，从他所

言的“我倒并不一定要跟随政府”来看，鲁迅其实是想追随政府的，他此时的思想已颇左倾，以致为创造社成员离开中大而气馁，许广平甚至建议他出任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编辑。但鲁迅在充满希望的同时，也充满了矛盾，先是纠结于“文艺”与“研究”哪个更重要，后又为“教书”和“办事”的选择而苦恼，他觉得“教书与办别事实在不能并行”，所以他最初对中大安排的“主任”一职，表示“那种烦重的职务，我是不干的”，但是随着他在厦大风潮中影响力的展示，他又表示“我倒想再暂时肩着‘名人’的招牌，好好的做一做试试看。如果文科办得还像样，我的目的就达了”。而关于这些游移摇摆的根源，鲁迅自言是因为“我有两种矛盾思想，一是要给社会上做点事，一是要自己玩玩。所以议论即如此灰色。折衷起来，是为社会上做点事而于自己也无害”。然而正如他自己体会到的，“但我自己就不能实行，这四五年来，毁损身心不少”，更多时候他选择了“为人，是可以暂以我为偶像，而作改革运动”^[28]。这个切身体验在广州迅速得到了验证，形势逼迫着他去充当新的角色。

二 主动革命：战士招牌与党化教育

鲁迅初到广州，就陷入了被包围的状态，“访问的，研究的，谈文学的，侦探思想的，要做序，题签的，请演说的，闹得个不亦乐乎”^[29]。首先来的是中共方面，“毕磊和陈辅国几乎每天都和他见面”^[30]，实际上这是陈延年的事先安排：“一是决定由党总支指派毕磊、徐文雅两同志、团组织指派陈辅国同志负专责与鲁迅先生直接联系，做好工作；二是决定搞好对鲁迅先生欢迎的筹备工作”^[31]；其次是国民党方面，“后台是国民党的青年部长甘乃光”的“‘左派青年团’的人也去找鲁迅”^[32]，甘乃光安排《国民新闻》副刊编辑梁式“为打听鲁迅消息的专员”^[33]，梁式利用自己是许广平同事的便利，找到孙伏园请他引荐并向鲁迅约稿，而“左派青年团”负责人李秀然则以中大学生会主席的名义，邀请鲁迅参加学生会召开的欢迎大会。

在1927年1月25日中大学生欢迎会上，鲁迅一方面批评“广东是旧的”，鼓动青年“有声的发

声，有力的出力”，“最希望的是，中山大学从今年起，要有好的文艺运动出现”，另一方面表示“我并非一个斗争者”，“我站在后面叫几声，我是很愿意的，要我来开路，那实在无这种能力……现在我只能帮帮忙，不能把全部责任放在我身上”^[34]。这个演讲集中反映了鲁迅的“两种矛盾思想”，既想革命又想独立、既想为人又想为己，然而校务委员朱家骅“接着演说，说这是我太谦虚，就我过去的事实看来，确是一个战斗者，革命者。于是礼堂上劈劈拍拍一阵拍手，我的‘战士’便做定了”^[35]。显然，中大学生欢迎大会实际是一个专门为鲁迅公开举行的革命“入会仪式”，“它们的主要目标是将个体从先前的忠诚和角色中脱离出来，投入到新的忠诚和角色中去”^[36]。

鲁迅演讲之后，国共两党迅速跟进，纷纷在官方报纸上发表欢迎文章，一改之前“著名文学家”的提法，称鲁迅为“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时代的战士，青年叛徒的领袖”，号召青年追随鲁迅“一齐到‘思想革命’的战线上去”^[37]。南方革命政党对“思想革命”的强调，反映了他们接续“五四”思想谱系、建构自身合法性的诉求，但是如果仔细看他们的文章，会发现广州革命党和青年学生对鲁迅的期待，和其自我定位有很大不同：首先，国共两党希望鲁迅“不愿做‘旁观者’，继续‘呐喊’”^[38]，他们虽仍旧称鲁迅为“思想界的权威者”“青年叛徒的领袖”，但更核心的定位是“时代的战士”。而“青年学生们所期待于鲁迅的，是要他作一个同他们一起走上街头，大声地议论革命与文学、革命与恋爱，有时又和群众一起摇幌红旗的实际运动的领导者”^[39]；其次是“希望先生继续历年来所担负的‘思想革命’的工作”，但又特别强调“他不但在消极方面反对旧时代，同时在积极方面希望着一个新时代”^[40]，实际暗示革命阵营自身是不能批评的；最后，“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看鲁迅的文学，肯定“论文实在比小说来得大”，认为其杂文“坚决彻底反抗封建文化”，而其小说只有“对于革命的消极贡献”，“他没有叫农民起来反抗他们的命运，也没有叫青年回到农村去改造农村。他只是很冷然地去刻划，去描写”^[41]。

显然，革命党的广州政权拥有对于政治一经

济—文化的一体化控制，这和鲁迅此前遭遇的大不相同。在北京时因为冯玉祥“对民众运动采取消极不干涉的状态”^[42]，以及“段祺瑞政府算得是很放任的，亦极尊重出版和开会的自由”^[43]，由此“权威已与权力分离开来，政治已与政府管理分离开来，公共讨论在政府机构之外的领域展开”，“赋予了‘文人’、‘启蒙哲人’和‘作家’一种新的功能和责任”^[44]，在这个以市民社会为依托的公共空间里，鲁迅他们拥有文化领导权。但是，广州革命党的权威和权力重新合一，公共空间由此不再是对抗性而是服从性的，而且他们对“思想革命”的理解，已经从“五四”国民性批判变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斗争，高度政治化了。

鲁迅很快发现了双方诉求的错位，意识到自己已经从北方“思想界的权威者”变成了一个南方“革命的战士”，由此遭遇了“怎么写”的问题。此时的广州，正在流行“革命文学社”的“内容注重革命文艺及本党主义之宣传”，革命党和青年们实际希望鲁迅写的就是这样的文字，然而鲁迅“对于先有了‘宣传’两个大字的题目，然后发出议论来的文艺作品，却总有些格格不入”^[45]。不仅如此，各方政治势力都在努力拉拢鲁迅，中共方面派人“把党团所领导的或受党团影响的定期或不定期刊物经常送给鲁迅阅读，有的可以请他指教，有的还可以争取他写文章”^[46]，而“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也出面拉拢鲁迅。陈公博、甘乃光、孔祥熙、戴季陶等官僚政客都送帖子请鲁迅吃饭，鲁迅一概拒绝”^[47]。

鲁迅发现自己“看不清那里的情形”^[48]，南方革命状态和北方大有不同，就以“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49]为理由，“投稿也很少”。实际上这都是鲁迅的借口，他后来直言“我的话一半是真的”，“至于我说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的话，那可的确是虚言”^[50]，“广州的学生和青年都把革命游戏化了，正受着过分的娇宠，使人感觉不到真挚和严肃”^[51]。但是这种“超然事外，不蓝不赤”的态度，“便被人称为灰色”^[52]，宋云彬公开发表了《鲁迅先生往那里躲》，批评“鲁迅先生竟跑出了现社会躲向牛角尖去了”^[53]，收到此文后，梁式“略经考虑，就发表在《新时代》。这一来，鲁迅就不能不发表文章了，几天之后，鲁

迅答复的稿子到了”^[54]。

鲁迅先委托许广平发表公开答复，强调自己忙于中大教务工作，需要时间来战斗，然后开始积极露面参加各种活动，而“在革命时期，一个地位稍高的人，整天忙的不外三件事：开会，演说，作文”^[55]，鲁迅不能写批判性文章，就先后参加了许多会议（教务会议除外），并做了多次演讲：

2月18、19日，赴香港青年会演讲，分别为《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

3月1日，参加中山大学开学典礼并演讲，题为《读书与革命》；

3月11日，参加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会并演讲；

3月12日，参加中山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典礼；

3月24日，作《黄花节杂感》；

3月29日，参加岭南大学黄花节纪念会并演讲，强调革命尚未成功，继承先烈遗志；

4月8日，赴黄埔军校演讲，题为《革命时代的文学》；

4月10日，做《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不难看出，这些活动多数都是官方性的活动，演讲也都发在党报党刊上，其中“总理纪念周”和“黄花节纪念”都是学校推行党化教育中最重要的革命纪念活动，它们有着固定的程式，譬如鲁迅参加的黄花节纪念，“秩序如下：（一）奏军乐。（二）向国旗行三鞠躬礼。（三）宣读总理遗嘱。（四）孔庸之先生和周树人演说。……（五）唱国歌。（六）学生代表齐集烈士堂前，列队往祭黄花岗”^[56]。这些庆典集会意在革命纪念和民众动员，像中大总理逝世二周年纪念会“高呼口号而散，全场革命空气异常紧张”^[57]，口号为“孙总理精神不死主义长在，孙总理是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导师……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党……孙总理领导下的国民革命成功万岁”^[58]。集会中的“名流演讲会”尤其充当着“以广宣传”“以引起民众之观感”^[59]的重要角色，他们通常由党政要员和文化名人组成，内容也多是政治性、革命性的宣传动员。譬如3月1日的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在教务主任鲁迅讲话之前，先后演讲的是中大校务委员朱家骅、广州政治分会代表胡春林、

国民政府实业部长孔庸之、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钟荣光、教育厅厅长许崇清、黄埔军校政治代表姜长林、中大政治训育部主任何思源，他们纷纷强调中山大学需要继承总理遗志、实施党化教育、建成党国最高学府，所以只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才能明白鲁迅演讲的内容为何是“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以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为它们正是中山大学的校训和办学方针。

显然，对鲁迅清党前的讲演、作文和活动的理解，不能脱离党化教育和国民革命的大背景。总体来看，它们有三个主题：首先是批评广州的“奉旨革命”和“革命精神已经浮滑”，“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60]，因而革命策源地有成为“后方”的“危机”^[61]；其次是鼓动青年“喊出来”，“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62]，同时呼吁“读书不忘革命”，“青年应该放责任在自己身上，向前走，把革命的伟力扩大！”^[63]最后是强调革命重于文学、革命人重于文学家，“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64]。

可以看出，“主动革命”的鲁迅实际是内因与外因交相混合的产物，它让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复杂关系：鲁迅一方面有主动革命的愿望和行动，“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来鼓动青年革命；另一方面这个“招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要服从革命宣传动员的需要，“我尤其怕的是演说，因为它有指定的时候，不听拖延。临时到来一班青年，连劝带逼，将你绑了出去。而所说的话是大概有一定的题目的”，这其实是在“‘革命的策源地’来做洋八股”^[65]。

三 被动革命：清党批判与历史重构

鲁迅和广州政党的“革命蜜月”，维持了不到3个月就破灭了。中山大学聘请了顾颉刚来做教授，这让与其素有嫌隙的鲁迅意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国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

者逐，改革者开除”^[66]，因而鲁迅在4月21日向中大提出了辞呈。但不巧的是，由于辞职时正值广州清党，于是就出现了流言，香港“《工商报》上登出来了，说是因为‘清党’，已经逃走”^[67]，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懂得，如果这个时候他离开广州，反动派就会说他‘逃走’，给他扣上一项‘捣乱派’的帽子，不但会有‘缙绅之忧’，还会有生命危险，所以他决定在广州待下来，不走”^[68]。

但鲁迅留下的结果，却逐渐发现革命不但有政治强制，更有压迫和杀戮。清党之后的广州，“言论界之暗，实在过于北京”^[69]，“虽然沉默的都市，而时有侦查的眼光，或扮演的函件，或京式的流言，来扰耳目”^[70]。首先，鲁迅感觉自己被监控了，往来通信“已经检查，并且曾用水浸过而又晒干”^[71]；其次，关于鲁迅的流言越来越多，香港的《循环日报》说鲁迅“原是‘《晨报副刊》特约撰述员’，现在则‘到了汉口’”，“意在说我先是研究系的好友，现是共产党的同道，虽不至于‘枪毙路寝’，益处大概总不会有的，晦气点还可以因此被关起来”^[72]，还有“鲁迅派”的流言，以致他从厦门带来的学生“至今还找不到学校进，还在颠沛流离”^[73]；最终让鲁迅感到“恐怖”的，则是清党的杀戮，起初他还试图营救被捕的学生、捐款慰问，但很快发现青年人正在相互残杀，而且极其随意广泛，“只消以一语包括之，曰：可恶罪”^[74]。

身处监控和流言中的鲁迅，失掉了之前“战斗和革命”的光环，既往的各种头衔“似乎已经革去”，“要我做序的书，已经托故取回。期刊上的我的题签，已经撤换”，甚至“有一种报上，竭力不使它有‘鲁迅’两字出现”^[75]。内心极为愤怒的鲁迅，于是“写信向广州市公安局长报告他的住址，表示随时听候逮捕，虽然公安局长回信安慰他，又有些有力者保证他的安全，而他似乎仍不免有点愤闷，烦躁”^[76]，鲁迅感觉自己陷入了“无物之阵”，“仿佛感到有一个团体，是自以为正统，而喜欢监督思想的。我似乎也就在被监督之列”^[77]。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为了消弭流言、躲避危险，开始采取一些行动重构自己的公共形象，他一方面

不再参加公开的革命活动，不再公开演讲撰文，而是“看看绿叶，编编旧稿”^[78]，有意将自己塑造成一个杜门著述的纯粹学者，另一方面又选择性地参加了一些学术活动，譬如7月16日在知用中学演讲《读书杂谈》，7月23日开始暑期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些演讲随后都发表在了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鲁迅以此既是证明自己并未逃走，还可自由活动，又向公众表明自己是一个不涉政治的隐士，也就是他后来所言的：“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79]鲁迅的这些策略最终取得了成效，他知道“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但我不走，所以报上‘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的闹了一通之后，倒也没有事了”^[80]。

但是，在“侥幸的是终于没有被做成为共产党”的同时，“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的鲁迅对国民革命的“幻梦醒了不少”^[81]，而最让鲁迅痛苦的，却是他从青年人的惨死之中，反省到“自己也帮助着排筵宴”，一想到自己之前鼓励学生读书不忘革命的言行，鲁迅就非常自责：“中国的筵席上有一种‘醉虾’，虾越鲜活，吃的人便越高兴，越畅快。我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82]，“我疑心吃苦的人们中，或不免有看了我的文章，受了刺戟，于是挺身而出而革命的青年，所以实在很苦痛”^[83]。在这种自我痛责之下，鲁迅一度“立意要不讲演，不教书，不发议论，使我的名字从社会上死去，算是我的赎罪”^[84]。

也正因此，鲁迅对该年7月北新书局出版钟敬文编辑的《鲁迅在广东》非常不满。此书收录了鲁迅初到广州的演讲和文章，以及当时人关于鲁迅的评论，呈现的是那个清党前主动革命、动员青年的鲁迅形象。为此鲁迅致信北新老板李小峰，一方面要求“将书中的我的演说，文章等都删去”，另一方面强调单是“看了《鲁迅在广东》，是不足以很知道鲁迅之在广东的。我想，要后面再加上几十页白纸，才可以称为‘鲁迅在广东’”^[85]。而在给翟永坤的信中，鲁迅也表示“这些议论是一时的，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很两样”^[86]。显然，他认为存在着“两个鲁迅”形象，还有一个和《鲁迅在广东》中的激进战士形象不同的“鲁迅”。

而正在这时，远在北京的《北新》周刊上发表了读者时有恒的信件，询问“鲁迅先生的‘思想革命！救救孩子！’的精神，都不见于文字中了”，而“在现在的国民革命正沸腾的时候”，他们“请求于鲁迅先生来亲自出马，对现社会下攻击”^[87]。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意识到自己仅仅做一个“沉默”的隐士是不够的，他必须重新向广州之外的人，尤其是原来北京的思想圈子解释自己之前在广州的行为，公开发表自己对于国民党“清党”的看法，进而重建自己的公众形象。为此鲁迅在《北新》发表了《答有恒先生》的公开信，一方面检讨自己是“做醉虾的帮手”，另一方面批判国民革命的变质和恐怖，这之后鲁迅开始大量发表文章，矛头直指南方的革命党人：首先是对“青年”的批判，鲁迅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88]，“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后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89]；其次鲁迅指向了倡议清党、“大呼‘打倒……严办’”的革命文学家，批评知识阶级蜕变成了杀人工具，“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90]；最后，鲁迅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国民革命和国民党，在他看来，“这次的革命运动，也只是在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等言词的掩护下，肆无忌惮地实行超过军阀的残酷行为而告终”^[91]，南北政府本质上是一样的，“在五色旗下，在青天白日旗下，一样是华盖罩命，晦气临头”^[92]，而国民革命不过是“受机关枪拥护的仁义”，是一场“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93]的循环杀戮，其正义性和进步性彻底丧失掉了。

而另一方面，鲁迅对自己“清党”之前的历史进行了重新的追溯和反思，在《北新》和《语丝》等刊物上，先后发表了《怎么写》《在钟楼上》《通信（复Y先生）》（包括之前的《通信（致李小峰）》《答有恒先生》）等文章，公开谈及自己是如何被迫“咬着牙关，背了‘战士’的招牌”，在“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做什么》等刊物用作宣传，以及自己批评广州的言论如何“被删掉了”等。如果将它们和《鲁迅在广东》中那些初到广州的革命言论对比，会发现双方主要有三点差异：（一）战士

招牌：主动配合还是被动革命；（二）广州之旧：永远革命还是奉旨革命；（三）革命文学：革命工具还是政治工具^[94]。不难看出，此时的鲁迅以否定国民革命的新立场，重构了自己的历史记忆，凸显出一个被革命绑架、利用和扭曲的“被动革命”的鲁迅形象，由此也让我们看到了“回忆的真实性问题，显然不仅有其主观方面，而且还有其社会方面”^[95]，其真实性也不是自明的。

四 文学政治：革命同路人与革命人文学

1927年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一起离开了广州，他的感受是“到时大热闹，后来静悄悄”^[96]，“我抱着梦幻而来，一遇实际，便被从梦境放逐了”^[97]。退往上海的鲁迅，开始全面反思自己这段奇特的“在朝革命”经历，最终指向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以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10月25日，鲁迅在原国立劳动大学做了《关于知识阶级》的演讲，重提“爱罗先珂（V. 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的问题，他全面审视了1922年至今的“知识阶级”命运，一方面认为“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另一方面又强调“真的知识阶级是不顾利害的”，“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由此，鲁迅提出了一个革命强力时代知识阶级该如何存在的重大问题——“然而知识阶级将怎么样呢？还是在指挥刀下听命令行动，还是发表倾向民众的思想呢？”^[98]鲁迅首先否定了时下南方流行的画着兵士农工、“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99]文学，认为这不过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革“命”文学。接着，鲁迅否定了住在象牙之塔里的“艺术家”，看起来虽然“平安”，然而背离了知识阶级的真正使命，他不喜欢这种“隔岸观火”的旧文艺，而是欣赏“连自己也烧在这里面”“文学家便是用自己的皮肉在挨打的”^[100]文艺。最终，鲁迅在苏俄文学中找到了生存的依据：一方面根据托洛茨基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建立之前的无产阶级专政阶段，由于无产阶级忙于革命以及专政期过短，只能让渡文化领导权给资产阶级文学家来建立“同路人”文学，客观上为继承资产阶级文化

遗产和建立文化联合战线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勃洛克、叶遂宁和梭波里这些人提供了现实的榜样，他们“不是新兴的革命诗人”，但同样“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101]。

鲁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102]不过，鲁迅的这个定位暗示了知识阶级的悲剧命运，“革命同路人”实际意味着知识阶级作为整体在革命时代的消失，他们由此变成了“有机知识分子”，而同路人“天生的不是革命家”^[103]，无法彻底党员化，双方随时存在分道扬镳的可能，所以同路人的结局“凡很可能有碰死在自己所讴歌希望的现实上的运命”^[104]。

“革命同路人”这个新定位，其实来自鲁迅到广州后的最大发现，即“在野革命”一旦成功，转变为“在朝革命”，就可能失掉“不断革命”的精神，退变成专制压迫的“在朝政治”。实际上南北革命和公共空间的机制是不同的，在北京时是“知识阶级”联合“革命党”一同对抗“北洋政府”，拥有文化领导权，而广州的革命党自己成立了政府，知识阶级的革命对象不但不能是革命政府本身，而且要让渡文化领导权，配合其进行宣传动员，最终这种“革命的政治化”导致的清党杀戮，导致了知识阶级的分化，一部分坚持“在朝政治”，一部分重回“在野革命”。因此，鲁迅在12月21日上海暨南大学所做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演讲中指出：“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文艺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两者之间，倒有不安于现状的同一。”^[105]由此，鲁迅提出了一个“文学/革命/政治”的三元论，而其要旨有两点：一是文学与革命同构但与政治对抗，它不仅批判现实权力的政治压迫，也批判革命内部的政治压迫，这是一种“永远革命”的在野批判精神；二是摆脱了之前新文化运动的文学工具论和文化本体论，强调了文学的本体性。

这种关于文学革命性和本体性的理解，反映了“鲁迅作为一位个体在面对整个革命时期的方式是精神式的、文学性的”^[106]，在他看来，“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

命文学’”^[107]。正因为“革命人”是“有革命精神的人”，所以他既能沟通文学与革命，也能沟通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这正是鲁迅穿梭于种族革命、辛亥革命、思想革命、国民革命这些不同类型革命之间的根源，他依据“革命精神”来看它们的现实性，一旦不能实现期待的变革效应，他就会以积极的态度继续寻求新的革命力量。

可以看出，“革命同路人”和“革命人文学”实际是鲁迅创造的新的革命政治，他沟通了文学和政治革命，但又摆脱了此前流行的“政党政治”和“街头政治”模式，创造了书斋文人的革命方式——“文学政治”：首先是文学的政治化，它强调了文学的政治参与性、革命批判性和文学本体性，而其本质就是彻底否定的“永远革命”的精神；其次是政治的文学化，由于专制集团“独占了全部的行政权力，从而剥夺了民众历练政治艺术的机会”，而文学“在这个现实社会之上，逐渐建造起一个虚构的社会”，也就是用理想国的应然来对抗现实政治的实然，由此“作家们不仅向进行这场革命的人民提供了思想，还把自己的情绪气质赋予人民……以至当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文学学习惯都被搬到政治中去”^[108]，最终文人“一变而为当时事实上的首要政治家”，而现代文学也就成为了现代政治的生成之场。

鲁迅的这个“文学政治”创造，如果放在知识分子史和近代中国史中，更容易看到其意义所在：“知识阶级”从晚清“五四”开始，实际就在努力构建以自身阶级为主体的领导权，一度形成了“戊戌前后的变法自强运动，辛亥革命运动，‘五四’以来的国民运动，几乎都是士的阶级独占之舞台”^[109]的状况，但因为核心定位是“盖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110]，“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决心，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111]，这种文化/政治的分离，导致知识阶级成了在野精英，拥有的只是一种“文化领导权”，它以欧洲18世纪自由主义为基础，视政治为“必要的恶”，既回避了民族国家和底层民众的政治经济诉求，又从整体上认同资本主义代议制，强调改良反对革命，所以最终在“五四”后被新起的国民革命所取代。而此时的鲁迅却在胡适、周作人等新文化

人物倾向学术文艺而落伍之际，积极参与政治革命，进而创造了“革命同路人”和“革命人文学”的“文学政治”存在模式。这是一个既不同于“五四”思想革命，也不同于国民革命的传统，而是一个属于鲁迅自身的“宝贵的革命传统”^[112]，它实现了“启蒙和革命的联姻”，诞生了“文学政治”的新知识分子参与方式，为大革命失败后知识阶级左派反对国民党统治，转为共产革命同路人，进而在左翼内部保持相对独立提供了合法性支撑，最终对现代历史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

所以，知识分子参与革命带来的并非都是专制压迫和扭曲变形，正如鲁迅自己指出的，“然而他眼见，身历了革命了，知道这里面有破坏，有流血，有矛盾，但也并非无创造，所以他决没有绝望之心”^[113]。从鲁迅在广州的经历看，“在朝革命”的他经历了“主动革命—反思批判—思想创造”三个阶段的变化，而其根源则是南方革命机制的日渐政治化，其中既有主动也有被动，既曾沉默也曾发声，由此让我们看到了鲁迅“主观精神结构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悖论性”^[114]，这绝非是“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那么简单。20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革命”带来的“与人生—社会紧邻这一性质赋予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特色”^[115]，如果研究者只从当下的“告别革命”的“去政治化”立场出发，就会脱离鲁迅和历史的实际，也正因此，把“革命”重新带回鲁迅研究，重新发掘鲁迅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其意义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1] 周海婴：《再说几句》，《鲁迅与我七十年》，第371页，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

[2] 李乔：《也谈“假如鲁迅还活着”——关于周海婴、陈焜披露的两条重要史料》，载葛涛编《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之初的鲁迅论争》，第433页，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3] [80] [82] [84] [88] 鲁迅：《答有恒先生》，《北新》周刊第49、50合刊，1927年10月1日。

[4] 参看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1976年10月）、沈鹏年《鲁迅在

广州时期的若干史实》(《光明日报》1961年9月21日)、朱崇科《广州鲁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5] 吴中杰:《鲁迅传》,第264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6][8] 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许广平文集》(第2卷),第1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另外的原因”指爱情。

[7] 许广平:《致鲁迅》(五十六),1926年9月30日,第486页,《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9] 鲁迅:《致许寿裳》,1926年10月4日,第563页,《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 参看邱焕星:《鲁迅与女师大风潮》,《鲁迅研究月刊》2016年第2期。

[11] 鲁迅:《可参与可笑》,《京报副刊》,1926年3月28日。

[12][113] 鲁迅:《马上日记之二》,《世界日报副刊》,1926年7月19日。

[13] 王奇生编著:《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第246—247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4] 鲁迅:《致李秉中》,1926年6月17日,第528页,《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15][24] 鲁迅:《致许广平》(六十七),1926年10月20日,第508页,《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6] 胡适:《惨痛的回忆与反省》,《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17] 岂明(周作人):《南北》,《语丝》第104期,1926年11月6日。

[18]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第4卷,第419—420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9] 鲁迅:《致许广平》(六十五),1926年10月16日,《两地书全编》,第50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0]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令》,《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18日。

[21] 《中山大学聘定教授讲师》,《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10月29日。

[22][30][31][47] 徐彬如:《回忆鲁迅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的情况》,《鲁迅研究资料》第1辑,1976年10月。

[23] 许广平:《致鲁迅》(六十六),1926年10月18日,《两地书全编》,第505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5]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 第一卷(1913—1926)》,

第83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年版。

[26] 鲁迅:《致许广平》(一一九),1927年1月2日,《两地书全编》,第599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7][50][97][104] 鲁迅:《在钟楼上》,《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爱而”即李遇安。

[28] 以上通信内容发生于1926年11月1日到1927年1月11日之间,参看《两地书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22—605页。

[29][35][65][73][75][77][85][96] 鲁迅:《通信》,《语丝》第151期,1927年10月1日。

[32][46] 黄英博:《血腥的斗争和伟大的跃进——记鲁迅先生应聘来穗》,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3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3][52][54][55][76] 尸一(梁式):《可记的旧事》,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第386页,第287页,第283页,第283页,第28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4] 鲁迅(林霖记):《鲁迅先生的演说——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席上》,《鲁迅在广东》,第85、87、92页,北新书局1927年版。

[36] 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第23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37] 鸣銮(余鸣銮):《欢迎鲁迅先生》,《广州民国日报·现代青年》第26期,1927年1月27日。

[38][53] 宋云彬:《鲁迅先生往那里躲》,《国民新闻·新时代》,1927年2月。

[39][51][91] 山上正义:《论鲁迅》,《鲁迅研究资料》第2辑,1977年11月。

[40][41] 一声(刘一声):《第三样世界的创造——我们所应当欢迎的鲁迅》,《少年先锋》第2卷第15期,1927年2月21日。

[42] 《柏经狄三、四月份工作报告》,《北京青年运动史料(1919—1927)》,第406页,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

[43] 《林语堂自传》,第39、41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44] 罗杰·夏蒂埃:《法国大革命的文化起源》,第10页,译林出版社2015年版。

[45] 鲁迅:《怎么写——夜记之一》,《莽原》半月刊第18、19合刊,1927年10月10日。

[48]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第17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49][68]宋云彬:《回忆鲁迅在广州》,《东海》创刊号,1956年10月20日。
- [56]《纪念黄花节的经过情形》,《南大青年》(广州)第15卷第21期,1927年4月3日。
- [57]《中山大学游艺场开会盛况》,《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7日。
- [58][59]《纪念总理二周年之宣传办法》,《广州民国日报》,1927年3月11日。
- [60][63]鲁迅(林霖记):《读书与革命——中山大学开学演说词》,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第122—123页,第122页,北新书局1927年版。
- [61]鲁迅:《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国民新闻·新出路》第11号,1927年5月5日。
- [62]鲁迅:《无声的中国》,马蹄疾:《鲁迅讲演考》,第15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64]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黄埔生活》第4期,1927年6月12日。
- [66]鲁迅:《致孙伏园》,1927年4月26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此信曾刊于孙伏园主编的汉口《中央副刊》第48号(1927年5月11日)。
- [67][72]鲁迅:《略谈香港》,《语丝》第144期,1927年8月13日。
- [69]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6月12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3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70]鲁迅:《〈小约翰〉序》,《语丝》第137期,1927年6月26日。
- [71]鲁迅:《致章廷谦》,1927年7月7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74]鲁迅:《可恶罪》,《语丝》第154期,1927年10月22日。
- [78]鲁迅:《〈朝花夕拾〉小引》,《莽原》半月刊第2卷第10期,1927年5月25日。
- [79]鲁迅:《致陈澧》,1928年12月30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1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81][86]鲁迅:《致翟永坤》,1927年9月19日,《鲁迅全集》(第12卷),第6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83][103]鲁迅:《通信(复Y先生)》,《语丝》第4卷第17期,1928年4月23日。
- [87]有恒(时有恒):《这时节》,《北新》周刊第1卷第43、44期合刊,1927年8月16日。
- [89]鲁迅:《〈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90][93]鲁迅:《小杂感》,《语丝》第4卷第1期,1927年12月17日。
- [92]鲁迅:《革“首领”》,《语丝》第153期,1927年10月12日。
- [94]参看邱焕星:《自我历史的遮蔽与重叙——鲁迅为何否定〈鲁迅在广东〉》,《鲁迅研究月刊》2014年第7期。
- [95]阿莱达·阿斯曼:《回忆有多真实?》,见《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第6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 [98]鲁迅:《关于知识阶级》,《国立劳动大学周刊》第5期,1927年11月13日。
- [99][107]鲁迅:《革命文学》,《民众旬刊》第5期,1927年10月21日。
- [100][105]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0—122页,第1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01]鲁迅:《〈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31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02]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44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06]丸山昇:《辛亥革命与其挫折》,《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 [108]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第182、187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 [109]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 [110]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
- [111]胡适:《我的歧路》,《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
- [112]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第1卷)》,第82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 [114]汪晖:《初版导论》,《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第14页,三联书店2008年版。
- [115]丸山昇:《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己之见》,《鲁迅·革命·历史——丸山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第36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何吉贤